



# 友谊宾馆的 那些事

The Stories of  
Beijing Friendship Hotel

【哥伦比亚】恩里克·薄萨达·卡诺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The Stories of Beijing Friendship Hotel

事

【哥伦比亚】恩里克·薄萨达·卡诺◎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 (哥伦比亚) 卡诺著; 山石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104-1141-0

I. ①友… II. ①卡… ②山… III. ①长篇小说—哥  
伦比亚—现代 IV. ①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6130号

## 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

作 者: (哥伦比亚) 恩里克·薄萨达·卡诺

译 者: 山 石

责任编辑: 李晨曦 李淑娟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总编室电话: +86 (10) 68995424 68998705

本社中文网址: <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5306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138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141-0

定 价: 29.80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埃尔维娅





## 写在前面的话



在北京北三环四通桥的南侧，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核心地带的中关村大街上，坐落着一座亚洲最大的园林式四星级酒店——北京友谊宾馆。这个绿色琉璃屋顶、飞檐流脊、雕梁画栋的建筑群落已有50多年的历史，以其恢宏的规模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被载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册》。据说，宾馆的设计思路出自我国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其建造风格突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整个建筑群落以友谊宫为中心呈对称的扇形分布，四周有四个相对独立而风格各异的小区：“苏园”为苏州园林的再造；“乡园”是中国北方农家院落的缩影；“颐园”是仿造颐和园景观特点的园区；“雅园”是为居住在这里的外国儿童设计的游艺乐园。

乍一看，友谊宾馆的中国味道体现在它园林式的建筑风格上，不过深入了解，您会发觉友谊宾馆最具有中国味道的是它的历史。友谊宾馆是中国最早的涉外宾馆之一，承办过许多国家级的重要活动，并且多次接待贵宾或国家领导人。所以，这里更像是一家特色博物馆，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和故事。

在这些众多的历史瞬间中，最吸引我们目光的则是一群曾经住在北京友谊宾馆的特殊的客人——外国专家们。《友谊宾馆的那些事》这本书给您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真实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

提起外国专家，许多中国人的心中总会涌起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处处都留下了外国专家的身影和

足迹。在共和国的伟大成就中，外国专家的功劳和辛苦是不能被忘记的：

早在解放前，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鼓舞下，英国的柯鲁克、伊莎白夫妇来到中国，从晋冀鲁豫解放区随军开进北平，数十年如一日地献身外语教学工作，培养出了乔冠华、章含之等成千上万的优秀外交、外语人才；

美国科技工作者阳早、寒春夫妇是中国的“洋”农民，先后在四个农场工作过，为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和奶牛养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日本专家“治沙愚公”远山正瑛的皮肤被中国北方的风沙吹成了深棕色，他的遗嘱是死后把一半骨灰留在他奋斗的恩格贝；

犹太裔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期间，努力向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后应宋庆龄之邀，参与《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的创刊工作，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毕生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

比利时专家范克高夫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变迁，运用他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努力搭建中国管理机构和外国商业团体之间的桥梁，成为北京奥运会的经济高级顾问和热心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中国引进的首位“洋厂长”、德国专家格里希，在武汉柴油机厂大刀阔斧进行管理改革，为国有企业放眼世界、引进技术和管理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还有担任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教练的韩国教头金昶伯，2008年带领中国女曲获得中国曲棍球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奖牌——北京奥运会银牌……

这些外国专家活跃在各行各业，施展着他们的才能，实现着他们的追求，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增进了中

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由此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爱和尊敬，被称为“中国的最好友人”。本书的作者——哥伦比亚人恩里克·薄萨达·卡诺——就是这些专家中的一位。

恩里克·薄萨达是一位作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官，是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62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游击队员不下山》和《八月的兽类》等散文和故事后，被哥伦比亚文化界评论家公认为“城市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27岁的恩里克·薄萨达，作为哥伦比亚的左派年轻优秀记者被邀请到了古巴生活工作了半年，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中国驻古巴大使，被邀请到中国工作。1964年年底，在世界革命浪潮当中，他第一次带着全家四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新华社和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工作。从此，他的生活就染上了“中国特色”。中国同事亲切地称他为老恩。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老恩先后四次到中国，总共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他亲身经历并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参与翻译过西文版的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第二至五卷）和《毛主席诗词》等，以及西文版的《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等著作。与此同时，老恩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十四大”和数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翻译工作。他的夫人埃尔维娅在中国期间，一直在大学当西班牙语老师，可以说她在中国也是桃李满天下了。

老恩在工作中慢慢地爱上中国，逐渐融入了中国社会，还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对中国怀有真挚的感情。他们一家爱中国、爱中国人民、爱中国文化，以至于当他们返回祖国哥伦比亚的时候，竟产生出一种极度的陌生感。正如作者在本书中写到的：“尽管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尽管他理解，或者确切地说是努力去理解他的同胞们，但很快便发现有些深层的东西将他与他们区分开来。”于是，带着对中国深深的怀念和眷恋，老恩把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和所见所闻作为素材，同时参照了朋友们的中国故事，创作出这部自传体小说《友谊宾馆的那些事》。

小说通过讲述一位哥伦比亚的共产党员西尔维斯特·博赛携家眷不远万里来华参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17年的故事，记叙了外国专家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中的经历、思想和生活以及遇到的中外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真实地反映了外国专家眼里的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历史巨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人观念的解放和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变迁的现实以及对外国专家的影响等等。

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透过外国人的视角，让那些中国人司空见惯而忽略的细节、那些不曾被中国人提出的问题跃然纸上，不仅使中外读者了解到外国专家在中国所发生的故事，而且通过那个时代在友谊宾馆的那些人和那些事，感受到历史留下的烙印，勾起心中许多难忘的回忆，同时让年轻的读者对那些未曾经历的时代多一点了解和体味。

如今，老一辈的外国专家大都已进入暮年，但深受他们影响的年富力强的下一代，有很多人仍活跃在中国，正在为中外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发展而继续努力着。这里有一组数据：1980年全国聘请的来华外国专家仅468名，2008年已达到48万人次；改革开放30年来一共累计引进外国专家478万人次。这些外国专家，不管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耄耋老人还是60、70后，他们的内心都对中国的中国充满了感情。他们的足迹今天早已迈出了友谊宾馆的范围，行走在中国更广阔的天地间。

友谊宾馆，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见证了历史，也在书写着历史。

新世界出版社  
编辑部

## 序

莱奥纳尔多·薄萨达

新世界出版社交给我一个很难的任务——为《友谊宾馆的那些事》一书作序。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两个难点：第一，这本书是我父亲写的；第二，我是书里的一部分。

父亲写的这些故事我读了好几遍，读着读着，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生活便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出来。虽然那个年代已经离今天很遥远了，却令我难以忘怀，那毕竟是我生活中一段最幸福的时光。

这是我父亲讲的故事。如果我擅长使用文字的话，我肯定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讲述。但是，我父亲是用他的世界观讲述的，我也很喜欢。

我不是作家，没有父亲那样好的文笔。不过我想，在这篇序言里，我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记忆和生活片段（有的已经写进了书中）呈现给读者，作为对我父亲的作品的一点小小的补充和佐证。

这本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很有道理！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面镜子。我就是那个样子。

我，一个4岁的哥伦比亚男孩儿，从世界的一端来到另一端，中途换了四次飞机；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雪；又很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友谊宾馆这个特殊的地方。它是一个容纳了来自欧洲、拉美、非洲、亚洲、中东等不同地区的专家和他们的家庭的大家庭。

友谊宾馆成为了孩子们的乐园，中文成为了这些外国孩子惟一的交流工具。孩子们在这里打闹撒欢儿，在红旗下茁壮成长。这是

一种含义不同的“幸福”。

我先是发现了手电筒，又在捉迷藏时用这道神秘的光发现了备战时的防空洞。为此我得到了父亲的“褒奖”——一顿臭揍。

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我们只能看一些革命样板戏和反映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电影，记得看了不下20遍的《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有意思的是，《平原游击队》里的英雄李向阳也是我。这名字是罗阿姨——我妈妈学校的同事给我起的，因为在我们刚刚到北京时，全家都需要改名字，我哥叫李松强。如果现在谁叫我向阳或列欧，我马上能分辨出来他是我红庙小学的同学还是育英中学的同学。

记得当时为了能看到“内部电影”，只好从友谊宾馆大礼堂的外墙爬到大礼堂最高的窗户，然后钻进去，藏在大幕后面反着看电影。还记得上中学时，为了能够进到住在部队大院的同学家，我戴着一个绿色军帽，穿着绿军装，在门口把自己说成是少数民族……我完全被同化了，甚至在1969年我9岁时，第一次和父母一起通过罗湖海关时，英国人说我父母绑架了一个中国孩子，我父亲很生气地让我把绿军帽摘掉才出了海关。

而现在我每每想起专家局和友谊宾馆保卫处的负责人找我爸爸谈话，告我的状，说我如何调皮捣蛋的时候，还有点后怕哪。

有些事，父亲也不一定知道。当年在紫竹园第一次“拍婆子”，现在觉得很可笑，但当时却很害怕。那个年代，外国人和中国人谈恋爱是完全被禁止的，尤其是我一个中学生和中国女孩约会更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求了一个男同学陪着我。30多年后，我才从当时的校长那儿得知，那个女同学约会后马上被叫到了校革委会做思想工作，不允许她再和我接触……在“十年动乱”中，自由和幸福被各种各样的规定和禁令束缚着。

在当年的供给制下，外国人享受着特殊待遇，在建国门外的友谊商店我们可以买到在外面商店买不到的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为了

给同学买茅台酒、中华烟、回力运动鞋等，我要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友谊宾馆到友谊商店去买东西……

1973年到1979年，我们家第二次来中国生活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文革”的结束，恢复高考……1978年，我第一次离开父母，一个人留在北京，并上了大学——北京医学院。

成为大学生以后，我的监护人，父亲单位——中央编译局外事处的负责人，和我父亲及我共同签署了一个“承诺协议”，在那上面我保证，要好好学习，不能“乱搞”男女关系，如果我让一个女孩怀了孕，责任完全由我承担……

这一年，我第一次一个人单独去香港旅行。在那儿，我买了邓丽君和甲壳虫乐队的音乐。

1981年，因为没有哥伦比亚的身份证，我回到了波哥大。在波哥大，我重新读了高中，因为哥伦比亚不承认中国的学历。后来我改行学了经济学，并和哥伦比亚姑娘结了婚，生下了大女儿李佳。

我父亲历来都认为，不管我的感情旅程是什么样的，我都会和一个中国女人结婚。果然，我的第二次婚姻是在北京，我又有了我的小女儿王龙歌。循环完成了。

有时候，有些事是很难解释的。想象一下，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突然发现不仅身上的肌肉和骨头在生长，而且，在身体里面还有一种东西也在生长，那就是拉丁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交融。这个奇怪的标本，历史创造的奇怪标本，就是我。如果没有那个冷战的年代，中国完全被封锁，我父辈那些外国专家就不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当然，我可能不是一个例外。因为在中国，有许多像老恩和埃尔维娅这样的夫妇，用中国特色标志了他们的孩子、孙子和不知其后多少代的将来……



## 1

“你想让我给你看《易经》算算命呢，还是根本不愿去想你将要去的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可能发生的事？”西尔维斯特·博赛的嫂子问他。

“看《易经》吧，这样我不害怕。”他答道。

于是她把书翻开，在印有六角形图案的一页上掷了三枚硬币。硬币划出向上的弧线，紧接着跌落到纸上，宛如死去的蝴蝶。但通过这个抛物线，西尔维斯特并没有预测到接下来的17年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没有想到，他会在中国待17年！而这一幕发生在1965年。

第二天，头还因酒精而隐隐作痛，西尔维斯特觉得美洲航空的客机就如同粉碎机般冲入群山，撕碎了云层，而他的视线却久久地停留在哥伦比亚棋盘般的翠绿的波哥大草原。

他们是如此年轻，愿意走遍天涯海角，愿意和最与众不同的人们一起生活，整个世界对于他们也只不过是小小的天地。对于不久

的将来，西尔维斯特一再对自己说：“从今往后一切都是崭新的、未知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想象的。”他鼓励自己，试图说服自己能够胜任一切，包括适应异国的生活。“异国人”，他脑子里又一次闪过了这个词，而且不由自主地与别的词语联系起来：反基督者、波利尼西亚人、食人者……

接下来的将是26个小时的飞行，途中经停五站。第一站是墨西哥，在那里，新中国的新闻社将交给他们到东京所需的费用以及给驻香港特派记者的一封介绍信。旅行如同动画似的地理教学，从波哥大草原——他永远的家——出发，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南部寒冷的北极城市安克雷奇，西尔维斯特和妻子纳塔利亚带着两个孩子在那儿停留一夜后转机。纳塔利亚给孩子们织的毛手套和帽子在极地的严寒下就如同薄纱一般。机场内有一排开着暖气的商店，四个人躲在一家商店里搓着手，让耳朵慢慢恢复知觉，但因没见到裹着熊皮的人而有些失望。对不远处爱斯基摩人唯一的印象就是他们无论碰到什么东西，都会爆出小火星并伴有电流短路的声音。孩子们发现用鞋子摩擦地毯就可以产生静电，于是便自得其乐地玩起来。

在酒店的床上，孩子们发现了几个投币口。塞入硬币后，床垫就会像野马般四下弹腾。四人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按摩，直到疲惫使他们倒在床上昏昏睡去。

在从安克雷奇去往东京的航班上，大儿子坐在一排三个座椅中靠过道的位子上，他旁边是一个中年的典型的拉美人。

就要飞往地球的另一端了！这个念头就如同棍棒击打在西尔维斯特头上。飞机的轰鸣打破了太平洋上的空寂。看不到黑夜，前方是无尽的白昼的阳光，以致使人怀疑天地间是否有黑夜的存在。

伴随着发动机的粗喘，飞机提升了高度，纳塔利亚发出一声尖叫。西尔维斯特本想打开进气阀，但被她阻止了——她害怕会影响飞行。西尔维斯特给了她一个柔情的微笑。儿子的邻座察觉到纳塔利亚的恐惧，于是招呼空姐给他们三人上点威士忌。

“别害怕，”他冲纳塔利亚说，“当机翼遇到冷空气时飞机就会摇晃。这在北半球的冬天是很常见的。”

“我知道，只是我不由自主就喊了，真不好意思。”纳塔利亚解释道。

“没关系，其实我没喊出声只是为了维护我们秘鲁男人的面子。”

“啊！您是秘鲁人？”西尔维斯特说道，“我们是哥伦比亚人。”

秘鲁人随即谈起了他几次去卡塔赫纳（哥伦比亚港口）的印象，并夸赞了哥伦比亚的咖啡和祖母绿。

西尔维斯特呷了口酒作为回应。飞机稳稳地飞着，如同法拉利在公路上奔驰。纳塔利亚拉开百叶窗，随即闭上眼睛，但阳光还是穿透了眼帘。

秘鲁人打破了沉默：“你们去东京？”

“我们在那儿就待几天，目的地还要更远。”西尔维斯特答道。

秘鲁人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们，西尔维斯特没有办法，只好说出答案：“我们去北京。”

躺坐在座椅上，秘鲁人喊道：“都说世界太小了！这话一点没错。我也去北京。”

前面还有11个小时的旅程，西尔维斯特知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都不可能不探触到对方的生活。“再说，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西尔维斯特想罢，接着告诉秘鲁人：“我们想在那里工作两年。”停顿了一下，他决定把包袱一下抖开，“我是记者，我夫人是老师。我们要去一所语言学院教西班牙语。”

“太巧了！我也是记者，这是我第二次去中国，为一个新闻社工作。”秘鲁人边说边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的名字是：拉蒂诺·曼杜萨。

旅途上竟然会遇上这么多巧合，西尔维斯特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看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拉蒂诺问道：“你们准备送孩子们去中国学校上学？”

“不知道。”西尔维斯特答道。

拉蒂诺解释说：“我这么问你们是因为我在中国待过几年，在这方面或其他某些方面，我的经验可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话题转到了飞机降落后各人的打算。

“有个日本朋友，也是同事，会来机场接我。”拉蒂诺说道。听到东京的名字，西尔维斯特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白雪玫瑰在火山口慢慢消融的画面。“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坐日本朋友的车。如果咱们住在同一个酒店的话，改天可以一起出来喝一杯。但如果咱们在这儿见不着，去北京肯定能再见面，因为那儿所有的外国人都住在同一个酒店。”

西尔维斯特在心里给自己提了个醒，曾有人告诉他在东京酒店一晚的住宿费就可能花掉在墨西哥中国人给他到香港去的所有的钱。他想着怎么先打发走拉蒂诺。他径直走到飞机尾部，要空姐给他介绍一个比较经济的住宿。她拿出一长串旅店名单，但上面没有标明旅店距离市中心有多远。突然间，他仿佛觉得绚丽的灯光全都不见了，心中充满了黑沉沉的夜。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们是这一小小部落的首领，在这陌生的地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亚洲让他觉得胆怯，因为它难懂的语言、陌生的城市 and 无尽的黑夜。



在酒店接待处办完入住手续后，西尔维斯特回到家人身边，却发现他们都已经困得倒在长沙发上了。他叫醒他们，冲他们做了个鬼脸，摇晃着手里的钥匙。坐上电梯，来到房间，困倦却烟消云散了。他们在壁橱里发现了和服和平底鞋，穿上后，看上去就像化了

妆似的。孩子们翻弄着床，想看看是不是和安克雷奇酒店的一样能够按摩。

西尔维斯特看了看表，指针已经拨为当地时间了。虽然暮色沉沉，但夜才刚刚开始。人群的喧嚣声不停地拍击着玻璃窗。“广岛！广岛！”这是他在陌生的语言中能分辨出的唯一的词语。随后又传来一句愤怒的：“滚回去！”他从窗户探出头，透过幕一般的雾，看到一大群示威者排成整齐的八列，额头上都系着白色武士带，此刻正停在红绿灯前。变成黄灯时，示威人群又继续前行，呼喊声也渐渐远去。

“看到了吗？”西尔维斯特转过头来，对纳塔利亚说，“在这里秩序就是一切，连抗议示威都不例外。”

这是一个明亮的早晨，但寒冷刺骨。孩子们冻得牙齿直打颤，不停地跺着脚，拍去薄手套上的冰霜以免被冻麻木了。最近的地铁站在街的拐角，比人行道要高出几米。在街道与车站之间，有一湾静止的水塘，边上三位老人静静地坐着，手里紧握着鱼竿。西尔维斯特心想，就算池塘里有鱼，也肯定早死掉了。

他们在银座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街两边全都是时髦的化妆品和时装店，充分展示了日本人对女性的喜爱。他们走进一家商场消磨时光，出门时售货员给了孩子们一人一颗珍珠。于是一家人又去了其他珠宝店，希望还能碰上这种好事，但后来什么也没发生。

他们继续走着，但不知为何总是与别人——不管男女老少——迎面相撞，直至人群使得他们前进不得，甚至连连后退。突然，西尔维斯特被挤下了人行道，其余三人跟在他后面，恨得想大骂日本人。但还没来得及张口，一个女孩用生硬的英语配以表情，向他解释说他们应该走另一边的人行道。这时，他才明白原来东京的人行道也是单行的，来去各走一边。他在红绿灯前停下，那里有许多等待的行人。他们的目光在他身上交叉相叠，使得他也想把眼睛转过来，像镜子般暗暗打量自己：一米九多的个头，外披一件长至膝盖

的套头长衫。他明白了人们为何对他如此好奇。灯变绿了，眨眼间人流大军已井然地转移到了另一边的人行道，他们的目光也慢慢地从他身上移开了。

准备回酒店了。逛了一整天，有一半的路程都是步行。他们逐渐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还找到一排小餐馆。在那儿，带肉丁或小虾块的汤面摆在玻璃柜里，旁边标示着价格。西尔维斯特从日元换算到美元，再从美元换算到比索，终于弄清楚这里的价格是最便宜的。由于没法沟通或交流，西尔维斯特就用手指着想要的饭菜给服务员看。现在是东京时间下午4点，他算了算，该是哥伦比亚的凌晨4点。

“我们要是现在就吃完饭回去的话，肯定会倒头便睡，结果明天一大早肚子就会咕咕叫着被饿醒。所以，”纳塔利亚宣布，“我们必须坚持到晚上8点。”

但服务员已经端着饭菜从厨房出来了。



西尔维斯特一觉醒来，房间里黑洞洞的。他怕吵醒别人就没开灯。“我现在在日本，”他想，“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头了。”他知道没有准备咖啡的用具，而此刻对咖啡的渴望正噬咬着他。转过头去，他发现纳塔利亚也睁着眼睛。她说道：“亲爱的，我做了个噩梦。”

“别讲给我听，求你了。”

“非得讲给你听，我可不想一个人陪着噩梦。”她压低了声音，“我们还在波哥大（哥伦比亚首都），那是周四上午，赊给我们饭吃的那个女人来讨债了。她一边敲打着门，一边骂我们是婊子养的。”

“这是你的潜意识在作怪，弗洛伊德说，每个人梦到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他伸出手去抱住她，“别忘了我们要去中国